

马里翁与德里达的“礼物”之争*

方 向 红

【摘 要】礼物现象学的可能性建立在直观、被给予和礼物的关系上。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中将直观等同于被给予，从而在《给予时间》中对礼物进行了解构，取消了礼物现象学的可能性。德里达在《论礼物》中把礼物与被给予性分离开，进一步强化了礼物的幽灵性特征；马里翁在《还原与给予》中把直观与被给予分离开，从而在《既与》和《论礼物》中从逻辑理路和现实案例两个方面捍卫了礼物现象学的可能性，将被给予性与礼物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两位现象学家的每一步思考都得益于彼此的文本对话或直接交锋，本文依据文献再现了这个精彩纷呈的思想争执过程并思考其对于当代现象学运动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马里翁 德里达 礼物 现象学 【中图分类号】B565.6

礼物 (don)，是马里翁思想的枢纽概念。这个词既可以回溯地导向马里翁作为方法论前提提出的概念“自身给予性”，也可以前进到对启示的理解和在学理上对所谓“现象学的神学转向”^①的证明。礼物，也是德里达晚年重点讨论的主题，它与民主、友爱、弥赛亚等等一起构成幽灵学（参见方向红，第4、12页）的关键词。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马里翁和德里达的礼物概念并不是各自根据自己的理论体系构造出来的，而是依据严格的现象学方法在继承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②，通过相互之间激烈的对抗和交锋而不断完善的。

马里翁和德里达之间的批评和反批评共有四次。第一次批评发生于1989年。马里翁在该年出版的《还原与给予：胡塞尔、海德格尔与现象学研究》（以下简称《还原与给予》）中点名指出了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符号问题导论》（以下简称《声音与现象》）中把胡塞尔的“直观”等同于在场形而上学的错误。尽管这里无论是德里达还是马里翁的文本都没有出现礼物一

* 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编号13AZX015）、中山大学“三大建设”项目资助。

① “现象学的神学转向”这一论断最先由D·雅尼考提出，完整的说法是“法国现象学的神学转向”。

②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除了现象学谱系中的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马里翁和德里达发生了巨大的、众所周知的影响之外，法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莫斯（Marcel Mauss）的《礼物：古代社会交换的形式与理由》（以下简称《礼物》）对两人也有重大影响。德里达在《给予时间：1. 伪币》中评价莫斯的《礼物》著作为“不朽的”，并作了多处引用（cf. Derrida, 1991, p. 39ff）；马里翁在《既与：论一种给予的现象学》中称《礼物》为“闻名遐迩的”并反复作了引用和说明。（cf. Marion, 1997, p. 109ff）虽然从引证时间和思路来看，德里达在先，马里翁在后，马里翁对莫斯的参照明显受到了德里达的推动和影响，但马里翁的思考仍然具有自己强烈的独立性和独特性。把莫斯置于两人之间，展开一场关于礼物的三人对话，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词,但由于直观和在场之间的关系对于正确理解他们各自的礼物观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笔者将其视为第一次交锋。两年后,德里达在《给予时间:1. 伪币》(以下简称《给予时间》)中明确批评《还原与给予》并对后者所蕴含的礼物思想予以反驳,取消礼物的现实可能性,同时也对《声音与现象》中的观点作了再一次的强调,对马里翁的思路进行了含蓄却尖锐的批评。1994年和1995年马里翁对德里达的反驳作了第三次集中批判,文献分别见之于《概说作为现象学概念之礼物》(以下简称《概说礼物》)和《既与:论一种给予的现象学》(以下简称《既与》)。此三次的相互批评,都是通过专著隔空进行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交锋是在会议上以专场对话的方式进行的。从形成文字的谈话记录《论礼物——德里达与马里翁的探讨》(以下简称《论礼物》)所透露的信息来看,与其说是对话,不如说是对决,双方唇枪舌剑,旁征博引,各抒己见,互不相让,场面十分精彩。

本文首先对马里翁与德里达在关于礼物的四次对话中所展现的不同观点作简要的介绍,同时对争论双方各自的论证逻辑进行适当的梳理和说明,最后将他们的异同放在当代现象学运动的背景下,探讨其独特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当然,与此同时两位思想家之间的真实关系也会得到说明。

—

在《声音与现象》中,德里达做了一件对于解构理论的创立来说极为重要的工作。他发现,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之“第一研究”中将符号分为表达和指号,然后根据其是否与含义相关联而将指号排除在符号的本质之外,但这种排除总是将含义回溯至直观和在场之上从而表明了“现象学对于传统存在论的依附关系”(cf. Derrida, 1983, p. 27; 参见德里达,第31-32页,译文略有改动),导致一种现象学形态的“在场的形而上学”。(Derrida, 1983, p. 57; 参见德里达,第65页)通过引入辩证法,德里达指出,含义总是延迟到场,总是以不同于他自身的方式到场,“延异”(différance)已成为含义的基本运作机制。他的目标在于,把处于先天观念性中的含义从其直观和在场中拯救出来,让它们恢复其差异性的任意连接和联想式的自由嬉戏的功能。(参见方向红,2006年,第242、267页)

在《还原与给予》中,马里翁一方面肯定德里达“秉承了现象学的决定性的价值”,承认他“进行了极其原创的思考”,另一方面也指出“德里达的解释仍然不够彻底……因为这种解释仍然依赖于对在场的极其狭义的理解,这种理解恰恰错失了胡塞尔把在场深化为被给予性这一点”。马里翁给出了自己的理由: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作出的突破是对直观概念的扩展即“范畴直观”概念的提出,但这种突破带来了连胡塞尔本人也没有明确意识到的后果。胡塞尔自己当然清楚,范畴直观实际上并不是本真意义上的即感性意义上的直观,它只是在类比的意义上才可称为直观,或者不如说,它仅仅仿佛是一种直观而已,它的真实含义是存在等范畴的自身被给予。然而,胡塞尔对“直观”与“被给予性”的不加区分的使用导致这一重大突破面目模糊。这种模糊性导致德里达没有认识到,胡塞尔虽然以直观和在场为依托研究认识论问题,但并不能由此将他的现象学归结为直观主义和在场形而上学,因为他不仅承认观念、含义等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不仅从感性直观的角度谈论它们的显现,而且在讨论范畴领域的显现时,由于描述现象学方法的严格使用,范畴直观——进一步的,所有的直观——被正确地理解为被给予性。(cf. Marion, 1989, p. 13, 14, 56, pp. 61-63; 参见马里翁,第3、4、54、60-62页)

这种误识让德里达仍在传统的意义上理解直观和在场,但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拒绝把观念对象的显现建立在直观的基础上。就这一点而言,他与胡塞尔甚至海德格尔是走在同一条道路上的。

马里翁对德里达的批评有两处。一处明确而温和。虽然德里达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但既然他让意义悬于“延异”之中，他的道路便没有走完，他的“解释仍然不够彻底”。另一处隐晦而尖锐。马里翁说：“他（指德里达——引者注）假设，由于含义与在场决裂了，含义便因此而摆脱了形而上学”。（Marion, 1989, p. 56）这一句放在括号中说出，看似轻描淡写，实际上包含着对德里达的严厉批评。试想，当含义与直观和在场决裂，含义便真的因此摆脱了形而上学吗？这不正是近代唯理论的道路吗？它通向的终点不正是沃尔夫式的独断主义和康德之前的旧版的形而上学吗？这种决裂不正是现象学所反对的吗？

二

直到1991年，德里达才为自己在《声音与现象》中的观点进行辩护。辩护工作初看起来比较含蓄，分两个步骤展开。第一步，在《给予时间》的正文中谈到“给予性意识”时，德里达似乎是顺带地指出，“此外，现象学家们经常从给予性的角度来使用这个表述，结果把它弄得极其复杂”，其实，“从胡塞尔开始，它的意思是指现象学的终极诉求、一切原则之原则，即原初给予性的直观（*l'intuition donatrice originaire*），就是说，它亲身或亲自给出事物或意义本身，我们也说，它在事物或意义的直接在场中给出它们自身”。（Derrida, 1991, pp. 71 - 72）这里没有点出马里翁的名字，但他显然是被包含在“现象学家们”之中的。“给予性”被强调了，而且在配上“原初”之后与“直观”合用——这种合用在胡塞尔那里是很常见的——，表明这两个概念在德里达眼里是等价的。可以看出，德里达在这里引用胡塞尔的原则和表述反对马里翁将直观与被给予分开的做法。

第二步，在“原初给予性直观”这里，德里达作了一个长篇注释（*ibid*, p. 72, 74），进一步展开他对马里翁的批评。他首先点明，马里翁讨论了他在《声音与现象》中对《逻辑研究》的解读，随后对马里翁的思路和结论作了大段的引用，最后话锋一转，大谈马里翁的呼声现象学。这样的思路乍一看令人费解，按理说，在引用马里翁对胡塞尔的微词和对自己的批评之后，德里达应该着手开始抗辩，但他却转身深究起马里翁呼声现象学的内在矛盾来：“马里翁既然已经宣称对呼声的一切确定性内容进行了还原，为什么他还要把‘纯粹形式的呼声’（因此也就是纯粹形式的礼物）规定为‘以天父之名’的呼声？”（*ibid*, p. 74）对于德里达的批评，我们将在文末为马里翁做点辩护，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样的批评？而且在批评之后，整个注释戛然而止？这在什么意义上算是对马里翁的批评的回应？或者，德里达究竟是不是在回应马里翁？

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这可以从德里达谈及引用马里翁原文的目的上看得出来。在注释一开始，德里达就明确指出，引用马里翁《还原与给予》第一章的结论，目的是“在接下来的交流空间中初步地勾勒出坐标，同时对现象学的被给予性在语义学上的关键点进行定位”。（*ibid*, p. 72）很明显，引用不是目的，真正的目标是要分析被给予性的语义问题。德里达自己的观点在正文中已经说得很明白，被给予，特别是原初的被给予，就是直观和在场。马里翁在《还原与给予》中反复证明的是，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所发生的突破，其真正意义恰恰在于将被给予性与直观相分离。按照这一思路，马里翁首先对呼声分别进行了先验还原和生存论还原，然后在自身被给予性的意义上对呼声进行了第三次还原从而获得了“纯粹形式的呼声”，可是，在具体描述这种纯粹的呼声时，马里翁竟然许诺“天父之名”，这不又回到了直观吗？这不恰恰证明了被给予性与直观根本无法分离吗？

现在我们理解了德里达的回应策略。他并没有正面回应马里翁的批评，而是向我们展示，如果按

照马里翁的原则，沿着马里翁的思路一路走下来，最终会得到什么结果。这种归谬论证的方式绵里藏针、力道深厚。

为《声音与现象》辩护，不是《给予时间》的主要目的。该书从诸多给出时间的案例出发，旨在对礼物进行解构。德里达看到，礼物，并非如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在时间中通过交往交换而实现自身。德里达发现，在语义学上，礼物（don）与时间有关，不管是在法语还是在英语中，*présent* 既指现在、在场，也有礼物之意。当然，仅有现在这个时间点是不足的，还有一个关键之处，必须有某种意志或意愿贯穿其间：“某人想或愿意给出，某人有意把某物给某人”，也就是说，其中不能缺少意向性结构。只有具备了这个关键点，礼物才有可能成为礼物，但吊诡的是，礼物在成为礼物的同时便自我取消、自我拆解了：“礼物的这种可能性条件（某‘人’把某‘物’给‘另一个人’）同时也是礼物的不可能性条件。我们不妨事先以另一种方式说：这些可能性条件所规定或产生的是对礼物的取消、毁灭和拆解”。（Derrida, 1991, p. 21, 24, pp. 22 - 23）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悖论现象呢？这要从礼物的本质说起。德里达认为，“要想有礼物，就不该有互惠互利，不该有报答、交换、回礼，也不该出于亏欠”，一言以蔽之，建立在以等价交换为原则的理性计算的基础上的礼物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礼物。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当他人给予我们礼物时，总是源于或多或少的对过去的感激或对未来的期待。从接受者的角度来看，把金钱等有形之物作为礼物接受下来，这会推动接受者进入亏欠、补偿和交换的循环从而在根本上取消礼物。对此，德里达断然指出，“要想有礼物，受赠人必须不做回报，没有偿还，无需清偿，不用支付，未签合同，从不欠债”。（ibid, p. 24, 26）即便没有实物礼物，即使礼物最终没有实现，礼物作为单纯的意义出现，给予者单纯的送礼意向，接受者单纯的收礼感受，这些已经足以引发象征系统的出现、交换关系的形成和循环序列的展开，最终还是会导致礼物的消失。

因此，德里达对来自给予者和接受者视角的礼物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规定。对接受者来说，“极而言之，他必须还不知道把礼物当作礼物”。德里达进一步指出，如果他已经知道这是礼物，那么，即使拒绝也不能阻止礼物的消亡。（cf. ibid, p. 26, 27）知能摧毁礼物，这是因为知处于时间化过程之中。我知道了，我便拥有了对此礼物事件的回忆，我也有了在将来以某种方式作出回馈或至少表达感激的可能，有时它在当下就会带来我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的变化，所以，德里达总结道：“时间的时间化过程（记忆、当下、期待；滞留、前摄、未来的内在性；绽出等）总是推动着拆解礼物的过程”。（ibid, p. 27）这一严苛的规定不仅对接受者有效，对给予者也同样适用。德里达指出，施予者在知道自己给予礼物时会产生行善或慷慨的感觉，有时在一种自身认同的循环中会出现自我欣赏、自恋式感动的情感，这些自我满足感会立即毁掉礼物。（ibid, p. 38）

知摧毁礼物，不知呵护礼物。同样，记忆打碎礼物，遗忘涵养礼物。德里达引入海德格尔关于存在之遗忘中的遗忘概念试图说明礼物在经受解构以后的显现机制。德里达指出，虽然遗忘不可能成为可规定、可呈现、可在场的某物，可是，我们并不能据此认为，遗忘什么也不是，它什么也不能给予我们，准确地说，遗忘并不是一种绝对的非经验和不显现，它不是对自身所承载的过去的完全的抹去，也不是对抹去者本身的进一步抹去。（ibid, p. 30）遗忘的出现过程是这样发生的：“要想有礼物这回事（我们不说礼物活动），必须有某物在某一瞬间来临，而这一瞬间无疑不属于时间的经济学，它降临到无时间的时间之中，结果让遗忘忘却了它自身，让我忘了遗忘”。（ibid）就像存在的历史是一部遗忘自身的历史一样，对礼物的遗忘不是由于自我的疏忽大意，而是由于，在另一种经验中作为真正礼物而突然降临的“某物”在通常的意义上并不显现，或者说，在通常意义上它显现为可加以规定的并进入符号学象征、经济学交换和循环的对象或意愿，这时，自我的目光自然而然地朝向这种

显现并将其认作礼物，这样，几乎不可避免的，莅临者被遗忘殆尽。

莅临者为谁？德里达在《给予时间》中并未作出进一步的探讨。笔者认为，答案应该是幽灵，幽灵学的建立是德里达晚期思想的重要成果。（参见方向红，2010年，第11-15页）该书有一处简单的断言似可为佐证：“无论如何，礼物诚然可以葆有其现象性，或者，如果人们愿意，也可以说，葆有礼物的表象，可是，礼物的表象本身，礼物的单纯的现象，便会将表象转变为幻象（*fantôme*），将活动变为拟像（*simulacre*），从而取消作为礼物的礼物”。（Derrida, 1991, p. 27）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还出现了“拟像”一词，德里达虽未对这个概念作出说明，但从文本的语境我们可以断定，所谓拟像就是被视为礼物的符号或实物，这些都是似是而非的礼物。

从幽灵学的视角看，先验意义上的礼物是可能的，它在不-知和遗忘中悄然现身；从直观的角度看，由于德里达坚持给予与直观密不可分的观点，包括礼物在内的任何被给予之物都必须首先处于直观之中，或者准确地说，首先表现为直观和在场，但礼物一旦成为现实的在场，就会立即堕入符号学的象征系统和经济学的交换和循环系列，因此，在经验中是不可能找到真正意义上的礼物的。这也是德里达反复陈述的观点：礼物一旦在场便不再是礼物，或者，礼物的可能性条件同时也标示着它的不可能性的条件。这两个几乎等价的命题正是马里翁所无法接受的。

三

马里翁对《给予时间》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文本上，1994年发表的论文《概说礼物》和1995年出版的专著《既与》。比较两个文本，我们可以发现，论文《概说礼物》在经过较大的改动后并入专著的第三卷。也许，我们也可以像人们评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之前的相关手稿那样说，前者是后者的第一版。在《概说礼物》中，马里翁首先梳理了德里达在《给予时间》中关于礼物的思想，随后立即展开批判。马里翁一上来就抓住问题的要害，点出他与德里达的分歧在于直观与被给予性的关系问题。与德里达的悖谬性说法——礼物一旦在场便不再是礼物——针锋相对，马里翁指出，“礼物”恰恰“在不在场中被给予”。（Marion, 1994, p. 80）如果我们把显现理解为以某种存在方式显现，例如以质料的、交换的或经济的存在方式，那么，礼物确实是无法显现的，这些存在方式中的任何一种都会让礼物失去自己的特性；可是，如果我们把显现理解为自身被给予，那么，即使失去了全部存在方式，即使失去了任何形式的在场，对礼物而言也不过是丧失了自身之外的存在而已，对它本己的自身给予机制丝毫没有影响。不仅如此，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存在方式恰恰“与自身给予的可能性本身背道而驰”。（ibid）

另一个等价性的命题——礼物的可能性条件同时也标示着它的不可能性的条件——也立即成为马里翁批判的对象。马里翁指出，首先，本来我们是在谈礼物，但德里达把礼物一分为二，谈礼物和它的条件，可是，由于条件在这里具有基础甚至在场之基础的功能，这就不可避免地堕入到典型的形而上学之中，让人不禁猜测，礼物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在场。实际上，把礼物这个概念一分为二只不过是把相互矛盾的要素简单并列起来，丝毫无助于问题的深入。其次，改变对礼物对象的表述，把它从被给予变成被给予的条件，这样做既不能让我们从礼物过渡到给予性本身，也不能把给予性从交换的经济学模式中解放出来。（ibid, pp. 81-82）^①

上面的批判只能算是一种在理论上展开的、思辨性的反驳，这里的批评留下一个重要的有待回答的问题：既然礼物可以脱离存在论而显现自身，那么，它是如何显现的？我们可以在经验领域里发现

^① 同样的说法在《既与》中得到了重复。（cf. Marion, 1997, pp. 117-118）

它吗？马里翁也问了同样的问题：“如果礼物无处追踪，那我们可以在哪里找到它？我们如何走近它？”（Marion, 1997, p. 121）

为了直接具体地回应德里达的挑战，马里翁对德里达在《给予时间》中关于礼物的思想作了梳理，他挑选出德里达四个代表性的论点：第一，“要想有礼物，必须没有互惠互利”。（Marion, 1994, p. 77; Derrida, 1991, p. 24）第二，“要想有礼物，受赠人必须不做回报，没有偿还，无需清偿，不用支付，未签合约，从不欠债”。（Marion, 1994, p. 77; Derrida, 1991, p. 26）第三，“……[对礼物的]遗忘应该彻底，这不仅从接受者的角度看是这样，而且首先[……]从给予者的角度看就是如此”。（Marion, 1994, p. 78; Derrida, 1991, p. 38）第四，“对他而言，如果礼物作为礼物出现，那么，这种单纯的认识就足以取消礼物”，或者说，“礼物，只有不作为礼物出现，才可能是礼物”，或者说，“如果它（指礼物——译者注）在场，它就不在场”。（Marion, 1994, p. 79; Derrida, 1991, p. 26, 27, 28）^①从这四个论点中我们自然引出这样的结论：既没有给予者，也没有接受者，更没有礼物。这正是德里达的观点，他从礼物的不可能性出发把礼物引向另一种可能性即幽灵化的可能性。马里翁也看出了这个不可避免的结论，他意识到德里达在此提出的挑战的严重性，将其称为“障碍（obstacle）”和“困境（dilemme）”（Marion, 1997, p. 115），但他拒绝追随德里达走上幽灵学的道路，而是另辟蹊径，提出了一条独树一帜的解决方案。

这条蹊径便是上文提到的马里翁反德里达之道而言之的宣示：“礼物在不在场中被给予”。现在，我们不仅回到上面的挑战性问题，而且从上面的结论出发，那些问题之所问从礼物扩展到给予者和被给予者：一个不在当下、不含在场的给予者、被给予者或礼物是否可能？如果可能，那么这三者是如何显现自身的？这种自身显现是如何为我们所经验的？马里翁创造性地回答了这些看似不可能有答案的问题。他依次设想出接受者、给予者或礼物的分别非当下、不在场状况并在现实中找到相应的案例。譬如，在人道主义捐款中，在对敌人和忘恩负义者提供帮助的情况下，在为团体献出时间或生命的人那里，接受者是面目模糊的；遗产继承者在接受遗产时，赠予者已经濒临死亡或离开人世，艺术家的表演、运动员的胜利、恋人的情感给接受者带来的享受是他们自己无法想象的，就是说，处于他们的“知”之外；承诺、和解、爱恨、祝福与诅咒等符号性礼物，它们不同于物理对象的具体在场和感知的当下，有些礼物虽然通过对象而表现出自己的在场，像纪念品对旅行地的暗示、戒指对婚姻中身体奉献的隐喻、王冠对权力的象征等等，但对象对礼物本身所起的仅仅是索引、指示或支撑的作用，如此等等。（cf. *ibid.*, pp. 126 – 151）

这些案例选择得非常巧妙，不仅引导我们走出了德里达指出的理论“困境”，而且天然地符合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基本方法——先验还原。与礼物相关的超越者有三个方面即接受者、给予者和实体对象，马里翁每次设想其中一方的非当下和不在场，这正是广义上的现象学悬置^②。通过悬置，礼物的被给予过程成为先验现象学的经验，礼物本身也成为自己给出自身的内在运动，恰如马里翁所言，“礼物，一旦其对象的超越性被置入括号，就会还原至对接受之物的体验”。（*ibid.*, p. 157）

这样，他便以现象学的方式证明，如果我们将直观与被给予分开并在后者的意义上理解礼物，那么，在主体或客体意义上的接受者、给予者或礼物的缺失不仅不会像德里达认为的那样导

① 顺带指出，马里翁在“概说礼物”中对德里达关于礼物论断的上述梳理被原封不动地照搬到《既与》中。（cf. Marion, 1997, pp. 65 – 66）

② 之所以是广义的原因在于，虽然非当下或不在场仍是存在设定，但不对当下或在场与否作出判断的悬置行为给出的是更弱的论证前提。

致礼物的不可能性，反而彰显了礼物本身的可能性，让礼物本身的自身给予和自身显现过程为我们所体验。

四

《论礼物》记录了在专题会议中马里翁和德里达的直接对话和面对面的交锋。

马里翁在会议一开始就承认，在被给予性问题上，《声音与现象》对《还原与给予》具有“引发”（occasion）作用，而这一问题又以变样的方式深刻地影响到礼物问题。（cf. Derrida & Marion, p. 56）但德里达毫不留情，他一上来就斩断被给予性与礼物的关联，坚定地认为在礼物与被给予性之间不存在“语义学上的连续性”，并从学理上指出，这种断裂，无论在胡塞尔还是在海德格尔那里都存在。在胡塞尔那里，没有证据表明，在被给予性与礼物之间有着“明显的、可以理解的关联”；对于海德格尔来说，“es gibt（有，它给出——引者注）”所给出的“礼物”与作为“直观的被动性”而言的“被给予性”是迥然不同的东西。（ibid, p. 58）

这种断裂可以概括为：被给予性与直观、在场、认识相关，也就是说，与存在论相关，而礼物“完全外在于经济的视域，外在于存在论、知识、述谓句、理论规定和判断”，换言之，礼物一旦与直观、在场和存在论沾上丝毫关系，它就不复为礼物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需要“重新激活”康德关于认识与思考的区分并将其应用到礼物上来，即礼物无法认识，但可以为我们思考。还有一种关于认识与行动的区分也可以强化我们对礼物的理解，即“礼物是某件你做了但你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情，你不知道谁给出礼物，谁接受礼物，如此等等”。（ibid, pp. 59 - 60）

一言以蔽之，只有直观才与显现和现象有关，而礼物是无法显现的，因此，德里达“怀疑礼物现象学的可能性”。

马里翁立即予以反驳。他先作了一个技术上的说明：在《逻辑研究》中，含义无需直观而可以被给予，甚至胡塞尔承认有“逻辑学意义上的被给予性”。（ibid, p. 61）有趣的是，德里达马上同意了这种说法，但紧追不舍的问题是：“礼物是什么？”同样有趣的是，马里翁也随即认可了德里达对礼物所做的区分：礼物是被推向极端的问题，无法解释和认识，但可以彻底地被思考。

德里达没有对他的让步提供说明^①，但马里翁紧接着对他的妥协作出了解释：在胡塞尔的对象性意义上以及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意义上，确实没有任何视域可供礼物显现，就是说，对礼物的认识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思考它，但在被给予的意义上，一个新的、比对象性和存在更宽广的视域向我们敞开，一大批新的现象呈现出来，于是我们仍“处于现象学的领域之内”，一种礼物的现象学是可能的。（ibid）

接下来马里翁摆开阵势大谈礼物的诸种现象，看起来像是《既与》关于礼物现象的压缩版，这种报告式的回答方式终于还是被主持人打断，德里达趁机发起了在我看来整场对话最重要的反击：马里翁承认，要想让礼物本身（as such）显现出来，必须对接受者、给予者和礼物进行还原或悬置，可是，若果真去除接受者、给予者、礼物以及相关的直观和意向性，所谓的现象学还剩下什么？所谓的现象学分析还能描述什么？所谓的礼物自身（as such）还存在吗？（ibid, pp. 64 - 65）马里翁回答说，我们无法对接受者、给予者和礼物同时进行还原，每次只能悬置其中的一个或两个，当然，这样一来，“我觉得，为让我们安心起见，就不存在‘本身’（as such）了”。（ibid, p. 65）

这次反击非常严厉，让马里翁放弃了“礼物本身”这种说法，但这种放弃与马里翁的整个思路

^① 在笔者看来，最大的可能是，德里达会认为这个意义上的被给予性还不是现象学的。

是矛盾的。德里达对马里翁的回答显得很满意，但他没有止于此，而是乘胜追击。他紧接着问道，按照三者缺一或缺二的描述模式对礼物的结构进行还原，每次总会有一个或者两个要素被保留下来，这个或这些在该次还原中无法去除的要素，例如，或者是给予者，或者是被给予者，或者是礼物，或者是其中的两者，会立即启动“礼物的摧毁过程”，这不正是礼物的不可能性吗？不仅如此，正是礼物的不可能性呵护了事件本身，但现在马里翁又试图取消“本身”，缺乏“本身”的现象学还是现象学吗？这难道不是现象学的“第一个异端”？（cf. Derride & Marion, p. 66）德里达进一步分析说，马里翁悬置了视域，但又把礼物与现象学的被给予性联系起来，在马里翁的思想深处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现象学意义上的被给予之物，无论它是在感知中、在记忆中还是在直观中被给出，都应当是上帝的礼物。这不正是康德的“派生性直观”吗？

马里翁选择性地对上述问题作了回应。（ibid, p. 68）他自己的哲学最终走向神学和天启，而德里达的哲学终点是作为空间的空间（Khora），这不也是以神学为归宿吗？其实在理论的目的地方面，他与德里达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他们之间真正的分歧之处还是在于礼物与被给予性之间的关系。至于他的哲学是否是现象学的异端这一问题，马里翁觉得还是留待后人评说，他还暗示，德里达仍然囿于传统现象学之中而不能自拔。

对于礼物与被给予性之间的关系，马里翁在谈到否定神学与解构理论的不同时作了一个重要的补充。在经过了被给予性还原之后，直观重新回到了礼物现象学的中心。当然，这时的直观不再是传统现象学意义上的意向与充实、含义与充盈的结合体，而是相反，大量的现象、众多的经验、过剩的被给予物涌现出来，但我们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概念和语词，无法发现其中蕴含的含义，更不可能形成合适的意向。（ibid, pp. 68 - 69）

在此之后，两人的反思多于交锋，总结多于冲突。对话在马里翁和德里达各自对自己的理论内容、学术旨趣和思想归宿作了简洁而系统的表达之后结束。

五

马里翁与德里达的“礼物”之争，争的并不是单纯的对礼物概念的定义，——实际上他们对礼物之本质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承认，不计回馈的赠予才是构成礼物的核心要素，他们都拒绝把处于经济循环或象征交换中的对象称为礼物。他们争的是一群通过礼物而引入的概念，如直观、明见性、被给予、意识、体验、自我、存在等等。这个术语群非同小可，它们是现象学大厦的柱石，或者说是现象学道路的路标，正是它们规定着现象学的外貌或路向，对它们的意义的任何改变都会带来对现象学所谓的“实事”本身的重新认识和定位，带来现象学运动的新阶段或新范式的出现。因此，这场争论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特的理论现象呢？马里翁和德里达，他们具有同样的现象学背景，都熟悉并批判地继承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思想方式，均同意对礼物的本质规定，可是，他们对现象学关键术语的理解为什么会如此大相径庭？从现象学运动可能出现的新阶段或新范式这一设想出发，我们或可暂时对马里翁和德里达的礼物之争以及他们之间的思想关联作出下面的评论。

马里翁和德里达实为一体两面的关系。前者是正面，后者是反面。前者将“给予”从胡塞尔的直观之中分离出来，然后剔除海德格尔曾经赋予它的存在论基础，重新注入经过改造的胡塞尔的先验哲学维度。这样一来，一方面，给予获得了先于自我学、意识论和存在论的地位；另一方面，被剥离

了给予性的直观返回到它的本来含义，在存在论上为礼物的到来准备好了基地^①。

后者以否定的方式证明了这条道路的必要性。如果将直观与给予性等同起来并与在场绑定在一起，那么就会出现一系列在常识和语义学上矛盾的结果，例如，礼物与被给予性没有关系，可是，礼物正是在给予和被给予中发生的，我们如何把礼物与被给予性割裂开来呢？再如，在现实中礼物不可能发生。马里翁已经指出了诸多严格意义上的礼物在现实中发生的案例。

当然，否定不是完全的消极，它具有积极意义，正是它启发和引导马里翁走上了一条正面阐述礼物的道路。从这一视角来看，德里达和马里翁的运思是走在同一条道路上的，而这条道路的可行之处依赖于我们严格地回答：如何正确地看待传统现象学基本概念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准确地实现从经典现象学到当代现象学的转型。看来，对传统现象学的概念尤其是直观、明见性、自我、意识和存在等核心术语进行反思的时候到了^②。

参考文献

德里达，1999年：《声音与现象——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符号问题导论》，杜小真译，商务印书馆。

方向红，2006年：《生成与解构：德里达早期现象学批判疏论》，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幽灵之舞：德里达与现象学》，江苏人民出版社。

马里翁，2009年：《还原与给予：胡塞尔、海德格尔与现象学研究》，方向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莫斯，2002年：《礼物：古代社会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Derrida, J., 1983, *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 Paris: PUF.

1991, *Donner le temps, I. La fausse monnaie*, Paris: éditions de Galilée.

Derrida & Marion, 1999, "On the gift: a discussion between Jacques Derrida and JeanLuc Marion", in *God, the Gift, and Postmodernism*, ed. by J. D. Caputo & M. J. Scanl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Malo, A., 2012, "The limits of Marion's and Derrida's philosophy of the gift", in *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 52, No. 2, Issue 206.

Marion, J.-L., 1989, *Réduction et donation. Recherches sur Husserl, Heidegger et la phénoménologie*, Paris: PUF.

1994, "Esquisse d'un concept phénoménologique du don", in *Filosofia della Rivelazione*, Nr. 1-3.

1997, *étant donné. Essai d'une phénoménologie de la donation*, Paris: PUF.

Milbank, J., 1995, "Can a gift be given? Prolegomena to a future trinitarian metaphysic", in *Rethinking Metaphysics*, ed. by L. G. Jones et al., Oxford UK: Blackwell.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黄慧珍

① 这种直观，借用胡塞尔的词汇来说，就是有充盈而无含义或对象，或者说，就是单纯的直接看到，尚未被归于任何意义或观念。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马里翁因“天父的呼声”而重新堕入的“直观”并非德里达或胡塞尔意义上的直观。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对前文所述的德里达的指责进行辩护。

② 马里翁和德里达的这场争论的重大意义目前尚未映入我们的眼帘，即使在海外，由于纠缠于一些次要的概念，导致此意义也隐而未彰，例如，卡普托（John D. Caputo）虽然发现马里翁和德里达两人“说的很多是同一件事”，但他终究还是把这同一件事限定在“不可能性这个问题”上。他没有意识到，他们两人的分歧是表面的，他们之所以说着“同一件事”，是因为他们走在同一条道路上；马洛（A. Malo）和米尔班克（John Milbank）虽然看似对立，前者想把马里翁和德里达的礼物哲学的限度落实在给予者和接受者的非对称性上（Malo, p. 168），后者对给予行为的非对称性特征极力贬损（Milbank, p. 124），但实际上他们都把对称性或它的反面当作走出马里翁和德里达的思想的通道，殊不知，无论是前者对非对称性的改造还是后者对非对称性的“污蔑”都还处于德里达的解构的射程或马里翁的还原的范围之内，德里达和马里翁相反相成地竖立起来的新路标仍为枝条藤蔓所覆盖。